

張勳復辟與

段祺瑞

桂
崇
基

民國六年張勳擁戴溥儀復辟，段祺瑞率兵救平之，於是國人乃以三造共和之功歸之，事實俱在，誰曰不宜。但張勳陰謀復辟，段祺瑞是否參與其間，或派代表參與其間，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所不能不問的一個問題。

張勳復辟之先，首有府（黎元洪）院（段祺瑞）之爭，繼有督軍團倡亂，毆擊議員，要求解散國會，聲勢洶洶，幾有不達目的不止之勢。凡此都是段祺瑞所一手造成。於是黎元洪完全無可再忍，衝冠一怒，乃下令免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本來段祺瑞未曾把這位大總統黎元洪放在眼裏，始終視其為政治菩薩，甚至國務總理不屑與大總統見面，凡有公事接洽，乾脆命總統府秘書長張國淦，或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代為傳話。其時，段祺瑞氣餒之高，可以想見。今竟為黎元洪所下令免職，心豈能甘，乃運用各種計謀，必欲驅逐黎元洪下台，以報此一箭之仇。但黎元洪為合法總統，不能隨便驅其下台。必須在政治上掀起一大風浪，而使黎元洪無法再幹下去，始能達此目的。這一大風浪就是復辟。

或問復辟陰謀是與段祺瑞有關，究竟有無證據。效限於篇幅，僅舉二事為證。

一、張勳復辟失敗，逃入荷蘭使館，段祺瑞乃又任國務總理，重掌北京重權。其時，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館，自然無顏復職，段祺瑞一箭之仇終得以報，其志得意滿，不言可喻。為敷衍全國輿情，不能不發佈通緝復辟犯的命令。這本來是一篇官樣文章。以往歷次政潮，發佈通緝令者與被通緝

者雙方都不把它當一回事。過了一些時日，被通緝者又可堂而皇之，不但自由活動，甚至重又入閣，擔任要職。但張勳畢竟是一個武夫，對這個通緝令却認真起來，在荷蘭使館公開宣稱，如相逼過甚，則將全部經過公佈於世，同時并於十日發表通電如左：

「變更國體，事關重大，非勳所獨能主持。……去歲徐州歷次會議，馮、段、徐、梁諸公及各督軍，無不有代表在場；即勳此次到京，徐東海，朱省長均極贊助，其餘各督軍亦無違言。芝老（段祺瑞）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動到京後，復派代表來商，謂只須推倒總統，復辟一事自可商量。……此等鬼蜮行為，不可不佈告天下，咸使聞知，除將歷次會議紀錄並往還函電彙集刊印分送外，先此電達。」

康有為為復辟案中另一要角，亦與徐太傅（世昌）書，痛論復辟之經過：

「……馮華甫（國璋），陸幹卿（榮廷）皆無違言。馮華甫且謂張紹軒（勳）豈能辦此，促僕出山主持，彼自相從。僕又從周孝懷詢問段芝泉（祺瑞）主意，亦謂民主日爭，非君主不可，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是亦君主立憲政體矣。」

張勳發表通電，舉國皆知。康有為致徐太傅書洋洋五千餘言，載不忍雜誌第九、第十兩冊。此雜誌係公開發行，段祺瑞當然看到。對此一電

一電一書段祺瑞竟無一言以申辯，不啻與美國前副總統安格紐之「不爭辯」(no contest) 如出一轍。

二關於段祺瑞究否參預復辟陰謀，徐道鄰曾經說過這樣兩段話：

「『北洋史話』說，五月二十二日，張勳在徐州開第四次會議，討論復辟的計劃，『徐樹錚也參加了。徐表示：芝老祇求達到驅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三、頁一三九)。這倒是可能的。六年一月五日張君勳給梁任公(啓超)的一封信，有『少軒(張勳)於又錚揚言去元首之語，極不謂然』一句話(梁任公年譜，頁五〇九)，可資佐證。」

「『史話』又說：『徐樹錚回到天津來，向段報告徐州(第四次)會議的一切內容。因此段黨和研究系人物就決定採取他們原已計及另一陰謀計劃，就是暫時不表示反對復辟，甚至偽裝同意，引誘張勳放心大膽地進行復辟，假張勳之手驅逐總統，然後舉起擁護共和的旗幟來，起兵打倒張勳，恢復段的獨裁政權』(三、頁一四三)。(我想這很可能接近事實。因為在這個時候，祇要合肥(段祺瑞)或梁任公出來說一句反對復辟的話——六月七日，熊希齡就發表過一個反對清帝復辟的通電——張勳就不會有發動的膽子。)(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一九八頁，民國五十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徐道鄰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言論謹慎，為徐樹錚的第三子，而徐樹錚又為段祺瑞的靈魂，

言聽計從。道鄰對於其父及段祺瑞的政治作風，必有深切了解。是以道鄰一則曰「這倒是可能的」，再則曰「我想這很可能接近事實」，當可作為定論了。

或謂段祺瑞於民國元年一月二十六日會聯合將領五十人通電主張共和政體，可見其衷心是擁護民國的。殊不知段祺瑞率兵攻打漢口、漢陽以遏阻義師，是奉袁世凱之命，後來頓兵不進，是奉袁世凱之命，現在通電主張共和，也是奉袁世凱之命。試問聯署通電的五十名將領，自段祺瑞以下，究有何人懂得共和政體為何物者？最堪注意的，張勳亦列名其間，且高居第三名。倘因張勳列名此電，便說他是擁護共和的，豈不笑煞天下人？這五十名將領的唯一的，就是逼迫清廷退位，而由袁世凱登上寶座。這個寶座究竟是皇帝或總統，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他們在那時候也不知道皇帝與總統的區別所在。即以復辟而言，段祺瑞所關心的就是如何迫使黎元洪下台。倘使黎元洪已經下台；而張勳此次進京，所帶衛隊不止二千人，可以支持相當時日；各省督軍遵照徐州會議約定，紛紛起兵響應；薄儀第一道諭旨又晉封段祺瑞為王，並任命他為總理大臣，則段祺瑞的動向如何，便不可知了。

民國初年各省將領，不問北洋的，或非北洋的，十之八九都是胡天胡帝，亂作非為，反覆無常，爾虞我詐，督軍團亂，張勳復辟，不過其一例而已。但同時也讓我們說一句公道話，賣國之事，似乎未有所聞。尤其直、奉、皖三系首領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都是愛國心頗強的人。

吳佩孚最盛時期，虎踞洛陽，統兵百萬；北自山海關，南至長江流域，都是他的勢力範圍；他的一舉一動，關係北京政局的安危。他在洛陽過五十歲生日，真是「八方風雨會中州」，盛況空前。國民革命軍北伐，汀泗橋一役，擊潰吳之主力第三師，其大將劉玉春，陳嘉謨相繼被俘，其他所部陸續投降，可謂全軍盡墨。吳佩孚落荒而走，間關入川，投奔楊森。沿途艱險，非筆墨所能形容。楊森招待初任於白帝城，繼移居萬縣。中央責令楊森收繳其衛隊槍械，而四川軍人也不願以本省資源供養客軍，尤怕其再作政治活動，對吳之留駐四川，並不歡迎。吳乃發表通電，表示專事倘佯，不問理亂。窮途潦倒，非常人所能堪。適於此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城二郎少將，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帶了十五六名將校，從宜昌乘小型兵艦專程訪吳，表示：(一)願供給私人借款一百萬，(二)願贈步槍十萬枝，山砲五百門，機關槍二千挺連同彈藥，由小型艦艇運送入川。這對於一個久掌兵符而今落魄的人自然是一個絕大誘惑。但吳佩孚却義正辭嚴的對日本人說：「過去我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是不在於槍砲與金錢。我如果願借外債，引外援，何必等待今天。中國事應由中國人自了。貴國的盛意，我是不會接受的。」(楊森著、吳玉帥與我，中外雜誌，第七卷，第四期，二二頁)

抗戰期間，吳佩孚營居北平。日本人請其出山，組織政府。他提出唯一條件：請日本軍全部退出中國，並聲稱必要時當以一死拒之。(同上，第五期，七一頁)

